

皇民文學中的政治想像

許麗芳*

〔摘 要〕

本論文以當代文學研究引起較多關注且評價分歧的四篇皇民文學作品為研究範圍，分別是於 1937 年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41 年陳火泉的〈道〉及 1943 年先後發表的周金波〈志願兵〉與王昶雄〈奔流〉。

於研究之思考角度上，本論文強調認同背後所呈現的意義，「認同」之意義是扣緊「認同」之形構所牽涉的兩個環節，一是自我的反省、解釋與「敘述」；其次是，個人之「認同」的形構必然涉及人際與社群的關係。同時以歷史脈絡之主導為思考前提，強調環境對於個體之決定性影響。尤其著重自我意識與形成自我意識的權力運作相互辯證，反省特定歷史或政治時空對主體的影響與運作。

皇民文學的創作與評論經過日本與國民黨政權的變遷，不同的民族立場、建構過程以及論述建構的目的，使皇民文學的作家作品必須面對不同的質疑與爭議，對於作品本身所實際顯現的內涵與意識型態反而有所忽略。

關鍵字：皇民文學、民族、認同、意識型態、殖民、詮釋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前言

政治氛圍與正確之影響下，皇民文學在不同時代及不同的研究取向中，亦有不同評價。殖民地的歷史因素使無論是皇民作家本身或作品中的知識份子，在歷史民族認同上難以自由選擇，甚至時至今日，其人及作品亦難擺脫以民族意識為中心所做的評價。¹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被不同的民族主義集體經驗、

- 1 相關評論呈現兩種趨向：以中國為中心者如陳映真，〈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文季》1：6，1984，頁1-11。陳映真，〈思想的荒蕪——讀「苦悶的台灣文學」敬質於張良澤先生〉，《中國時報》1981.2.22 副刊。陳映真，〈以意識型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收於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陳芳明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論的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王曉波，〈台灣意識的歷史考察〉（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曾慶瑞、趙遐秋合著《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2003）。呂正惠，〈台灣文學問題：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呂正惠，〈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台灣文學「主體性」平議〉，《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等。另一以臺灣為思考中心者如葉石濤，〈四零年代的臺灣日本文學〉，《臺灣文學的悲情》，（台北：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葉石濤〈新文學家的雙重性民族結構〉，《中時晚報》副刊〈文學筆記〉，1992年4月12日。葉石濤，〈新文學作家的民族認同和階級意識〉，《文學臺灣》13，1995，頁9-11。羊子喬，〈歷史的悲劇、認同的盲點：讀周金波〈水癌〉、〈尺的誕生〉有感〉，《文學臺灣》8，1993，頁231-236。林瑞明，〈國家認同衝突下的台灣文學研究〉，《文學臺灣》。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臺灣文藝》63：16，1993，頁20-43。陳芳明，〈皇民化運動下的四零年代文學〉，《聯合文學》16：7，2000，頁156-165。等，亦有提出反省或同情者，如游勝冠，〈轉向？還是反殖民立場的堅持？——論張文環〈父親的要求〉〉江自得編，〈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第一屆台杏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2000）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I〉》9：11，2001，頁53-69。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10，2002，頁172-195。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台灣文學的研究在日本》，《臺灣文藝》16：136，1993，頁44-57。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臺灣文藝》13：132，1992，頁4-24。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二）另一種皇民文學：周金波的文學型態〉，《臺灣文藝》13：133，1992，頁4-25。許明珠。2000。〈近代與傳統的權衡：我讀王昶雄的〈奔流〉〉，《臺灣文藝》171，頁28-37。鄭明珠。2003。〈論「皇民文學」詮釋應有的態度〉，《東方人文學誌》2：1，頁151-174。塚田亮太、黃毓婷譯，〈閱讀『周金波日語作品集』：一位台灣「皇民作家」的精神軌跡〉，《台灣文學學報》3，2002，頁1-22。

敘事模式建構成不同的集體記憶。然而，無論是以中國中心或台灣中心對「皇民文學」所做的評價，其實都忽略其間並無所謂「民族」的意識，對於「民族」、「種族」、「臣民」、「國民」觀念混淆，可證相關批評對「皇民文學」中民族的認同與爭議實有待檢視。

本論文以當代文學研究引起較多關注且評價分歧的四篇皇民文學作品為研究範圍，分別是於 1937 年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²、1941 年陳火泉的〈道〉³及 1943 年先後發表的周金波〈志願兵〉⁴與王昶雄〈奔流〉⁵。四篇小說內容分別是：力求上進的知識份子因外在人事的腐敗消沉，而由積極漸入頹唐的心路歷程；一心追求日本精神，企求為天皇而死的樟腦技工，其充滿苦悶的皇民鍊成之道；留日知識份子自嘆不如庶民為天皇奉獻生命的率性真誠，從而立志追隨學習的熱情；以及留日醫師面對日本化即現代化與台灣故土之傳統，既意識到其間差異卻無法真正取捨所引發的掙扎與茫然等。

於研究之思考角度上，本論文強調認同背後所呈現的意義，「認同」之意義是扣緊「認同」之形構所牽涉的兩個環節，一是自我的反省、解釋與「敘述」；其次是，個人之「認同」的形構必然涉及人際與社群的關係。⁶同時以歷史脈絡之主導為思考前提，強調環境對於個體之決定性影響。尤其著重自我意識與形成自我意識的權力運作相互辯證，反省特定歷史或政治時空對主體的影響與運作。有關認同問題的思考，霍爾（Stuart Hall）的主張可資憑藉，其對認同的想法是，可以站在一個並非全然封閉的立場。處理的方式就是，「所有的發言都必須經過某種定位」，其以為，沒有立場的發言，便不會存在任何意義。因此每個人都必須找到一個立場。認同的過程變化多端，也許痛苦、傷害、損

2 本篇小說據張恆豪主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下文同。

3 陳火泉，〈道〉，《文藝台灣》6:3，頁 87-141。另據網站：王學玲譯，陳火泉〈道〉，「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1999.02.05。下文同。

4 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下文同。

5 張恆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下文同。

6 蔡英文，〈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的反省〉，《政治科學論叢》8，1997.6，頁 53。

失與消失，但還是必須找到自己的立場。這不代表是對自己說謊或造假，而是必須真正投入且判斷。⁷若以「認同」做為思考前提，則所認同者何？即是另一個有待釐清的課題。以中國或台灣意識做為論述皇民文學的核心，自是產生相當歧異之結論，尤其皇民文學又牽涉日本的殖民歷史與民族內涵。在論述過程中，政治時空的轉變是影響基礎核心與價值觀點的關鍵。皇民文學的創作與評論經過日本與國民黨政權的變遷，不同的民族立場、建構過程以及論述建構的目的，使皇民文學的作家作品必須面對不同的質疑與爭議，對於作品本身所實際顯現的內涵與意識型態反而有所忽略。因此，不以民族意識做為重新檢討皇民文學之前提，或許能為此一特定政治時空所產生的文學成果提供不同的思考途徑。

一、文本之時空脈絡：戰爭動員與身份論述

日本在台灣殖民措施擴及各方面，尤其在皇民運動時期，對語言及教育的刻意著重，更見日本在精神上徹底改造臺灣的企圖。1930年代起，日本殖民政府為了戰爭需要，逐步將臺灣編入戰時體制，於臺灣從事戰爭動員，甚至於30年代以各種方式推動「皇民化政策」，國家權力達到全面動員，及至人心人命，使臺灣捲入戰爭之中，戰爭與皇民化運動所進行之徹底的社會運動，或可視為是「逆說的國民創造」，而與各類民族論述形成拉距衝突。⁸臺灣與日本彼此之競逐包含政治權力與文化影響之內涵，二者對於自身民族認同各有憑藉與價值取向，亦體現民族主義文化與政治之內在層面。

尤其1937—1945年階段，民族與政治價值與強制力更加明顯反映在語言與文藝等層面上，七七事變後，臺灣總督小林躋造為配合戰時體制，維持臺灣治安，進而利用臺灣人願意投入侵略活動，因而提出「皇民化」、「工業化」與

7 霍爾、酒井直樹，〈東京對話：馬克思主義、認同形構和文化研究〉，霍爾（Stuart Hall）、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台北：元尊文化，1998），頁178-180。

8 吳密察，〈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當代》100，1994，頁84-85。

「南進基地化」三口號。於「皇民化」政策下，臺灣總督加強推動「國語運動」，即普及日語、普設國語講習所，強迫學習。1937 年嚴禁報章雜誌之漢文欄，查禁漢文書房，禁以臺語廣播，頒定國語家庭。此際語言與民族密切相關，殖民與被殖民者各有立場與主張，卻因政治形勢之明顯差異而形成衝突，其間具有價值高下與優越感。

西野禮英稱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皇民化，是殖民地的傷痕，尤其是教育的刻意扭曲，「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以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耀的教育制度的確不就是對於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的彈壓還要來得野蠻。」⁹日本政府企圖透過「殖民教育體制」，培養具有日本國家認同的台灣人。強化現代日本與落後台灣的二元對立概念，因而造成台灣書房的沒落、傳統習俗的消失，使得日語的逐漸普及，及相對的母語的喪失，日本式生活象徵現代、進步的觀念逐漸成形，「同化型」的人物就誕生在這樣的殖民文化情境中。¹⁰

從民國 34 年 12 月 17 日《臺灣新生報》社論〈肅清思想毒素〉¹¹可以側面理解，當時知識份子面對思想與文化的改造力量，日本對於臺灣的統治手段：在政治上是採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在文化思想上更散播了無數的毒素，使臺灣同胞日日受其麻醉與薰陶，對祖國觀念模糊，逐漸離心，以遂其『日本化』和『皇民化』的目的。因此，不僅在語言文字上，竭力強迫其模仿日本、學習日本，即在一切圖書雜誌小說電影戲劇之中，亦廣泛的灌注誇張大和民族和頌揚軍國主義的謬論，使臺灣同胞在不知不覺之

9 王曉波，〈「皇民化」的歷史與真相〉，《台灣意識的歷史考察》，（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頁 284-285。

10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頁 55。

11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9：2，轉引《臺灣新生報》社論〈肅清思想毒素〉，民國 34 年 12 月 17 日。

中，自然而然的產生一種崇拜日本的自卑心理。¹²

在皇民政策與語言普及運動的強力推行下，漢族意識似乎已逐漸從臺灣人的歷史記憶中遺忘，大和意識則開始進入群體意識之中。透過信仰日本神話、祭祀天照大神，凝聚台灣的集體歷史記憶，進而創造一種與日本人共同的歷史起源與話語，從而確立新的身份認同。¹³此為民族價值之傳輸，卻亦是有意識與目的之傳輸，而非真正之種族同化，科恩（Hans Kuhn）對民族之定義為，「民族是一種思想狀態，認為國家為政治組織的理想形式，是文化創造力與經濟繁榮的根源。人的至高無上的忠誠就因此應該獻給國家，因為人的生命只有在國家的生命與國家的興盛中，才能存在。」¹⁴然而，在殖民之時空下，其間所謂的國家，實牽涉不同認同內涵，所謂的忠誠，亦有表達對象之差異考量。

戰後所謂「皇民文學」一詞，具有以台灣或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帶有對協力殖民戰爭與皇民化運動者的作品之「蔑視」與「排斥」意味。縱觀日後被歸入所謂「皇民文學」的作品，無論是被迫或受時代驅使所寫下的，多半具有作者的影子在內，以小說為例，小說作者與小說主角似乎都有某種程度的重疊，形成具有自傳色彩的文本。由此實可見，作者具有的認同的焦慮與困境，他們無法自外於小說中的主角而完全採取批判的角度¹⁵，相反地，他們連同其塑造的人物，有的感到惶惑頹廢、有的已然高呼聖戰萬歲。¹⁶自我認同的取向各有差異，無論是對日本殖民政權的抵抗或屈從乃至嚮往，均是作家個人的主觀認定及選擇，然而，無論認同內涵為何，形成的背景則是一致的，日本政權

12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9：2，2002，12，頁152-153。

13 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頁192。

14 水秉和，〈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發展Ⅹ當代〉17，1987引|Kuhn, Hans,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New York: Van Nostrand Co., 1965, p.9.

15 張恆豪，〈反殖民的浪花〉，收於張恆豪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372。

16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I〉》9：11，2001，頁142。

所提供、宣導及強制的一切制度價值為唯一的參照座標與形成脈絡，皇民文學的作家自亦無法超越。

主體認同有其特定時空的憑藉，文化認同不僅是族群意識所召喚的文化特質，也不是文化論述在修辭上所引發的客觀事實，認同本質上就是一種聯帶，經由權力宰制與意義的網絡，將人們網羅其中。¹⁷作家本身與創作亦然，其人意識與選擇取向往往因而被擇定形或形塑，甚至成為主觀的中心價值，不願被更動亦不見動搖。政治因素固然影響文學，但並非是一夕之間即可改變。張誦聖認為，文學體制及文學場域結構的改變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關鍵性政策的實施之間關係，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在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的一二十年間，文化體制仍然大體承襲前朝傳統文人。這種情況一直要到二零年代公學校普及、「書房」數量銳減、新文學興起才有顯著改變。而 1937 年漢文書報被禁，第二代殖民知識份子登上文化舞台，是文學體制改變的另一轉折點，諸多現象顯示，一個直接受日本影響的文化傳統和體制，已經在台灣這個殖民地穩固紮根了。¹⁸由此亦可見，身處當時的知識份子實難以避免地接受日本所輸出的價值。

就皇民文學作家之心靈地圖而言，無論其中留存多少的傳統殘餘文化，日本的現代與精神是不可避免的一部份。¹⁹另一方面，也因為具有文字的使用能力，知識份子方有接近依循現代日本生活的可能，也才有期待與隨之而起的苦悶掙扎。1937 年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出現的在差別待遇下「力求上進」的小知識份子形象，已經預示新一代日文作家在殖民教育底下認同與價

17 陳奕麟，頁 118。

18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周英雄、劉紀蕙，《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35。

19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北：巨流出版社，2001），頁 172。方孝謙於闡發泰勒（Charles Taylor）所謂「現代自我」的時，引申「現代性」自我認同的產生，如台灣遭受日本殖民的強制扭曲，此類認同的產生，都不免捨棄傳統的道德秩序，亦即殘餘文化，日本殖民政權對漢族殘餘文化的稀釋，形成龍瑛宗等人的認同內涵。

值觀的改變，追究這一成因恐怕正是探討「皇民文學」的必經之路。²⁰方孝謙引羅成純之言，以為龍瑛宗小鎮的問世，代表了台灣人作家群抗拒殖民統治的意識，已呈現「屈從及傾斜」的勢頭。從此之後，周金波（1941）、陳火泉（1943）、王昶雄（1943）主要作品就在「屈從」到「順從」的光譜間徘徊，刻劃著台灣知青對日本無可奈何的窘境。塚田亮太在論述周金波的文學時，分析時代與個人關係，以為不管時代如何違反理性，不管他們在「皇民化」的教育環境裏是否都不假思索地將皇民思想照單全收，他們所接觸到的理性世界儘管有限，但必定會使他們反思，為何非得成為日本人不可的命題。但其亦承認，當時知識份子除了以一個日本人生存下去之外，並無其他的選擇，也未必一定是理性計算的結果。²¹

二、文本之意識型態：戰鬥鍊成與美學價值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四篇小說均呈現對日本精神或日本生活的渴望及追求的熱情，以及追尋過程中所遭遇的焦慮或失落。在殖民時期的當時，日本除了做為統治政權外，也是一個現代知識文明的提供者，是知識份子的精神世界提供者與指導者，更是做為與台灣本島的鮮明對照。無論是抽象層次的日本皇民精神或是具體的日本優雅生活模式與事物，均對知識份子產生渴望、追求及矛盾衝擊的矛盾掙扎心靈。

（一）型塑之自我與認同

日本精神是當時知識份子的精神指導，是當時青年對日本精神的景仰，無論是〈志願兵〉明貴主張的自我認同或進六的神秘拍掌，彼此的共通點是對日本精神的欣悅與感動，如明貴所言：

20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頁 56。

21 塚田亮太，〈閱讀『周金波日語作品集』：一位台灣「皇民作家」的精神軌跡〉，《台灣文學學報》3，2002，頁 14。

在皇居的二重橋前能感受到嚴肅的叩頭那種感激就夠了。到靖國神社參拜叩頭時，那種說不出的感激，能體會出來就足夠是日本人，並且不是故意擠出來的眼淚，而是很自然地流下來的眼淚這就很充分了。

至於〈道〉對天皇的敬仰奉獻則更加明顯，青楠所謂：

這種為當代天皇攘夷，洗淨夷狄之心的精神，這就是日本精神，我想這樣解釋。所以說，具有尊王攘夷的精神的人才是日本精神的所有人。

〈志願兵〉的日本精神是對皇居與靖國神社的感激感動，〈道〉的日本精神核心是為天皇而死，不計任何代價與利益地為天皇而死，且這種信仰不會動搖，甚至成為救贖人的力量。如〈道〉之「在天皇信仰，我可以在「天皇陛下萬歲」這個喊聲裏面看出拯救之道。」對日本對天皇的信仰已成為是個人生命的救贖。當時的台灣青年堅信日本精神及為天皇所做的奉獻犧牲，固然有日本殖民政權的強力干預及塑造的過程，然其中亦不免灌輸日本的美學價值。日本的戰爭語言具有浪漫色彩亦具昇華與超越性，以「日本男子之本懷」描述當時台灣年輕人申請當志願兵，「男子本懷」原指男子最根本的抱負與熱望，至此成為當兵的代名詞。若從服務天皇的角度而言，則當兵為「大君之御楯」及「醜之御楯」，以為自己是天皇微不足道的盾牌而已。並以「若櫻」指稱台灣的志願兵軍人是「櫻花」，飛行員是「荒鷲」亦即「鷹」，「九段之櫻」即指奉祀在靖國神社的死亡將士。²²櫻花飄落具有浪漫美感，以「散華（花）」、「玉碎」表示來表示為國捐軀的軍人，當軍人的遭難時被想像成隕落的櫻花，死亡因而具有淒美之感，將現實殘酷的戰爭與毀滅化為淒美的哀傷，在燦爛繽紛之際飄然而逝，彷彿是值得慰藉的自我實現，也是人生極至的昇華與超越。²³既是日本式的美感

22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出版社，2002），頁 189-191。

23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205-206。。

價值，也是當時刻意的宣傳方向。日本的戰爭語言是美與死的結合，如此的美化宣傳雖無法確定令當時的軍人無視或無懼死亡，然而其中的人生美學與態度卻是影響深遠的。

日本的戰爭宣傳、學校教育，以及美學傳統的互相交融在一起，對於當時的軍人或知識份子無疑具有明顯的指導力量。在 1943 年 11 月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上，陳火泉以高山凡石之名發表〈談皇民文學〉，其云：

為大君、為祖國，而與敵人戰鬥之時，日本人的心中總是抱著必勝的信念，發揮勇往直前的精神，展現出著實令人感佩的姿態。描寫如此動人的姿態，加以昇華，使其更臻完美，這不就是文學者的工作之一嗎？」

「總之，如果文學者都有日本人的真誠，則天下無難事。「誠」，就只是「誠」而已。不計個人生死，捨身一搏，則事無不成者。而不能如此捨身者，應當體認到自己不僅不是文學者，而且也不是日本人。²⁴

此一發言內容有其時空與表達立場，是否即作者本心亦難以妄下定論，然其中態度與精神與〈道〉則是一致的。所以在〈道〉中青楠屢對於邂逅武宮崎以及其後的來信，及上司的關注鼓勵，以為此就是日本式的人生美感而深自感動。日本精神在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與王昶雄〈奔流〉中具體表現在現代知識與積極創發的生命力。日本精神化為人生應有的生活典範與行為模式，它代表理性秩序、革除陋習、對現代的推崇，可以讓人獲致成長與超越、避免愚癡庸俗的修身安頓之道，而不是超越的精神指導原則。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表現知識份子力爭上游，極力與本島人加以區別的心態，陳有三穿和服、講日語，藉以區別自己所不屑的同族。其文云：

24 高山凡石，〈談皇民文學〉，《文藝台灣》7:2，1944.1。

陳有三經常穿著浴衣，笨拙地繫著寬條布帶，毫無目的地漫步街頭，看著如同石罅中的雜草那般生命力的人們，想著自己與他們之間有某種距離，一種優越感悄悄而生。

唯美意象蘊含積極的創造力與戰鬥力，未必是向外的攻擊，更多時候是自我的超越及砥勵，如〈道〉中對工作的描述即見一斑：

但在東方，尤其在日本，自古以來，就有教人不要只看重頭腦和指頭的修鍊，而要尊重心靈和精神的鍊成之風。所謂「集日本精神之粹」的日本刀不用說，繪畫、雕刻、茶道、花道，以及其他的藝術也是如此。或齋戒沐浴，或坐禪靜坐，然後才著手動工，真是虔敬的態度。

崇尚自我鍛鍊的內斂價值亦正是日本式的美感價值。〈道〉中青楠以為，工作的專注投入與反省的自我鍛鍊，是極至的日本式心靈，是應有的生活及修鍊態度。

〈奔流〉中一再強調的是創造與戰鬥的人生價值，同樣的，如此的人生價值美學亦來自日本，無論是日本或東京，於當時均是現代文明及青春豪情的具體表現，也是當時知識份子的知識理想之養成所在，更是理想嚮往之鄉。所以在〈奔流〉與〈志願兵〉中都呈現了當初離開東京猶如告別青春自由的感傷。因此，對小說中的知識份子而言，離開東京等於向青春夢想與優雅自由的生命告別，東京集知識與文明，幸福與從容於一地，離開此地，等於精神的失落。因此，〈志願兵〉與〈奔流〉都有類似心理的描述。周金波〈志願兵〉中的「我」在基隆港口等待明貴所搭乘的船舶泊岸時，似乎也重回昔日的美好青春回憶，其中云：

回想起八年前，我也是像這樣地回到了家鄉，那時候雖然是較小的「吉野丸」級的船，但是同樣地孕育著學生時代充滿甜蜜的梦想、衣錦還鄉。

那是「吉野丸」級的最後航行，記得是叫「朝日丸」。那時候，我莫名地對來迎接的人的狂熱，就好像是別人的事一樣，讓它從身邊流過去，抱著陰沉沉的心情下了船。這大概是告別了雖然是孤獨卻充滿了自由——渡過了長年的東京生活所留下的那種哀愁的感覺。

〈奔流〉中亦提及對青春生命情境的回憶，「在那裏，我感覺到生活的價值」。其言云：

離開十年住慣了的東京，是在三年前的春天。現在閉上眼睛，當夜的情景，還可以歷歷浮上腦際。像長蛇一般開往下關的夜車，九點離開了東京站，經過有樂町、新橋、品川、大森，街燈逐漸從視野消失時，簡直無法抑制，熱熱的東西湧上心頭。不全是離情的淒苦，而是自己一旦回到鄉里，不知何時再能踏到這首善之區（東京）的心思，使我感到難以忍受的寂寞。這並不是年輕人的感傷而已。我在S醫大讀完了課程，一面就以附屬醫院臨床醫師，一面又以解剖學教室研究生的身份留下來。但是，這也是極短暫的事情，約莫一年工夫（在鄉里開內科診所的父親突然逝世，不得不立即束裝回鄉。想研究到定型的心情，以及對北國生活的留戀，終於在現實之前，立刻完全懾服了。繼承父親，一生埋沒於鄉間醫生的境遇，對我來說，是很不容易忍受的。）

美好經驗的逝去，亦見追尋至善完美之積極，由於東京是燦爛青春盡情揮灑的夢土，當迫於現實不得不離開之際，心情的感傷自不待言。

對優雅浪漫的事物的耽美與欣賞，在〈奔流〉中的表現更趨明顯，美好的事物其實都是日本意象，日本統治下的知識份子，不僅其人的知識與價值觀都來自日本，亦形成其人的生活規範與氣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的廖清炎與〈志願兵〉中甫自日本回台的張明貴，及〈奔流〉中的伊東，甚至〈道〉中以俳句做為心靈安頓的青楠等人物，無論是神采氣質、穿著裝束，乃至面對環

境的姿態，也都是有如日本人般的優越與超然，顯然日本或東京對於當時知識份子而言，是生活情調的典範，是青春的夢土與優雅的象徵，也是唯一的文明文化強權。

東京對故事中的人物而言，實有若故鄉，至少是心靈的夢土，因為是其人接受高等教育與現代啟蒙之所在，所以有回去東京的熱切憧憬，對關東平原氣候與美景的眷戀，東京女子的愛慕，日本新年的禮儀，起居的擺設，追憶求學習醫的從容自得，與返居單調現實的台灣相對應，沒有剖心相告之人，「正沉溺於彷彿客愁的狂暴的感傷中時」，見伊東春生的有若內地人的神情舉止與自信，而如獲異鄉知音般的親切。是以，即使必須面對惡陋的現實生活環境，日本式的美學與人生觀仍是其人精神超越的憑藉與生存的目標。

（二）價值之追尋與苦悶

無論是〈志願兵〉中的留日青年「我」、明貴，〈奔流〉中的留日醫師對東京的懷念，或〈道〉中青楠的極度日本化，以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穿日式浴衣蔑視本島人的陳有三、洪天送等，均懷抱深刻的日本價值。如此的積極向上的動力與期許往往伴隨苦悶與挫折，小說中的主人翁也不免意識到，在渴望努力及創造中，往往不是勝利的成就，而是失望挫折，以及因抉擇而生的矛盾與茫然。人生的追尋模式或許可以模仿日本式的精神，但目標卻未必可如預期那般，也能輕易達到如同知識心靈中的日本意象，各種現實的內涵是難以超越的障礙。

在獲致日本精神的方法上，小說中的人物各有主張，卻因身份立場的不同而有歧異。明貴以為皇民鍛鍊是解決本島人低文化又渺小的最好方式，但不同的知識階級，對日本精神的獲得途徑卻有所差異，進六則以為，「我說的是精神問題，就是注入日本精神」，以人的熱情可以直接與日本精神接觸。而明貴以為，日本精神的注入在於教育，「像你我一樣受過日本教育的人，誰也能成為日本人，像我的情形，我可以斷言我就是日本人，成為日本人有那麼困難嗎？我一點也不覺得。」

明貴的說法顯然是以在日本教育脈絡下培養出的知識份子的信念，日本的一切成為認同與參照的來源，事實上也是自我認同中無法選擇的前提。而僅公學校畢業、屬於庶民階級的進六割小指、寫血書參加志願兵的愛國行徑，則是另一階級所採用的激烈方法，與之前的拍掌感受日本精神一致，但卻為原本不以為然的明貴所肯定，這樣的辯論與實踐既是一種報國或改善社會的使命感，但更是人生目標的自我擇定與期許，這也是日本精神的具體展現。在殖民政權的主導下，知識份子的心靈被構造成既定的價值取向，影響其人的生活與信念。

在追尋與鍛鍊的過程中，面臨血緣身份的限制，遭遇日本人的不平等對待，這是知識份子苦悶焦慮的主要來源，也因而積極如何克服自己不具日本血統的事實。²⁵陳火泉〈道〉所企求的日本精神，不僅是一個具體的目的，也同時美化為人生價值的超越與提昇，〈道〉對於如何成為日本人亦有主張：

不是光繼承日本人的血統才是日本人，而是從小受日本精神傳統的訓練，因而不論何時都能表現日本精神的才是日本人。

內台共婚而來的血緣的交流……企圖本島人醇化為大和民族也不失為良策。但是不容置疑的，最一般普遍的捷徑，繼承日本民族的生活型態——信仰日本神話，祭祀天照大神，確立獻身歸一於天皇的信仰生活。而我這樣相信，只要這個信仰確立了，已經可以做為優秀的皇民而得救——因為，信仰就是自我消滅，是成就希望，是拋棄人間一切的東西，飛躍於神的世界啦。而且為了這個飛躍，不必需要時間，換句話說，把過去的東西溶入於我們之中——所謂使它變成無時間性的東西——直截了當地溶入。

那已經不是思想上議論，也不是口頭上的雄辯。只是熱情與覺悟也不行。最後的問題，必須實現在生活裏面，惟有在炮火中，在戰場之中，在這樣緊張氣氛之中，在燃燒的行動中，才能體驗到對皇民的信念。

因血統不同，我才主張精神的系統，透過精神的系統而與神道的精神——大和精神交流，誰說不可能？若是有人否定，是因為我本身的努力不夠，究竟

25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頁160。

血統與精神孰強？將有顯露的一天，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後的勝利必定歸於精神。

提及血統的差異與無法跨越，故而以精神的煉成、戰爭的投入來克服，其間的差異與種族而非民族。〈道〉中青楠的感嘆：

菊是菊，櫻是花，牡丹就不是花嗎？台灣人終究不是皇民啊！連人都稱不上。

他就像久病的人為了審查自己的衰弱程度而怯懦地撫摸瘦削的臉頰一般，思索著自己的悲慘身世。說穿了，就是被遺棄了似的，不由得他不感到孤獨感。雖看清「一視同仁」中的虛偽，但面對差別待遇，並沒有其他的反省或遲疑，而是不斷投入努力，其中的苦悶反而是來自成為日本人的目標未竟，而非目標本身的反省。

本島的知識份子既無法超越血緣的命定，只好以後天與外在的途徑來勉勵自己，如〈道〉所言，「在本島人之中，朝鮮人之中還有在滿洲人之中，的確具有這種（日本）精神的人。縱然那不是與生俱來的，但把它抱得緊緊的人還是應該有的。」日本精神固然是終極目標，但可以超越民族藉由自覺去獲得。

「他相信自己是個卓越的日本人。（做為日本公民，他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並不輸於任何日本人，他相信自己比他們的一個都強。）所謂「內地人」這個字眼，還有和他對立而被使用的「本島人」這個字眼，這些字眼給人的「語感」已然是相當的不愉快。他原以為：「要是內地人就……」、「要是本島人就……」這樣的思考比什麼都來得無聊。」

陳火泉在〈道〉中所呈現的固然是對日本精神的企求，但另一方面更強調為達此一目的所做的「自虐式」途徑，對於不被日本人認同的困境，歸咎於自己的努力不夠及方向錯誤，此一「道德自咎」（moral masochism）獲得日本人

的共鳴。²⁶「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大澤貞吉撰文以為，「他為了追求皇國日本的人臣之道，而不屈不撓勤於修練。同時也苦心積慮，浴血奮戰，克服所有的障礙，想要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也就是因為對成為日本人的用心執著，所以〈道〉中沒有其他角色與青楠加以對比，在日後的國府政權氛圍中，陳火泉亦藉此提出當時自己創作取向的一些解釋。

〈奔流〉中的「我」則在日本求學期間，不敢承認自己是台灣人的逃避心態，冒稱四國或九州人，用木村文六的假名等，其內心獨白就是台灣人複雜的心境：

你真是卑劣的傢伙，那顯然是鄙夷台灣的佐證，台灣人絕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愛斯基摩人。不僅如此，和內地出生的人，沒有任何不同。要有榮譽感！同是日本臣民的榮譽感。

之所以刻意隱藏台灣人身份，其實正是對自我的否定與不安，對照現代的日本，台灣有如「不體面的鄉下人」的母親，無法拋卻卻又無法融於現代的期望。一如窪川鶴次郎分析〈奔流〉言，「作者靠這兩個人（伊東和林柏年）的組合，剔出本島青年的深刻的煩惱，「無論如何，伊東的白髮，若不是這不顧一切的戰鬥的一種表現的話，又會是什麼呢？」作者下了最後的判斷。……這位作者使我想像到本島知識人的一個顯著的典型。」對日本精神的憧憬，「自己不能甘於出生於南方的一個日本人，沒有成為純粹的日本人，心不能安。並不是自動地努力於內地化，而是在無意識中，內地人的血，移注入自己的血管，在不知不覺間，已靜靜地在流動那樣的心情」。伊東對「我」而言，不僅具有日本化的教育與生活模式，乃至積極戰鬥的意識型態，也得以與日本女子結婚，各方面均是「我」心中完美的形象模範，而「我」卻無法擺脫單調無聊的台灣生

26 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台灣文學的研究在日本》，《台灣文藝》16：136，1993。

活環境以及最深沉的故鄉情懷，日本的青春豪氣對照故鄉的粗鄙單調，現代文明與傳統情感的難以兩全，形成痛苦無助的根源。

懷著浪漫唯美日式情懷去面對台灣的傳統人事與簡陋空間，對日本的嚮往是個人的心靈世界，但實際面對的卻是粗糙的現實與繁瑣的人事，個人侷限與苦悶即隨之而起，也呈現傳統與現代的不協調。因此，〈奔流〉中伊東春生對自己父母的忽視冷漠，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以及美好的脆弱性，也是「我」原有的夢想與想像受到挑戰，「在那一瞬間，伊東的尷尬究竟表示什麼意思呢？可以解釋為：由於不體面的本島人母親的出現，一向漠然的很大的幸福，好像碰上了現實，惶惑起來似的。」雖然「我」嘗試為伊東春生的拋棄父母「父母衝突與個性暴烈」與留日苦讀提出解釋，以做為追求夢想與戰鬥的解釋，甚至因此教育本島青年避免這一代的雙重矛盾。

在伊東認為，要成為一個道地的內地人，是要鄉土的土臭完全去掉，為了這個，連親生的親人也非踩越過去不可。在學校，或者在社會接受純日本化青年教育的年輕人，回到家門一步，就會被放到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這裏有本島青年雙重生活的深刻的苦惱。所以，要克服這種苦惱，向著單方面，從正面加以挑戰，並且非把它踏得粉碎不可。還有，在這個時代，我們為了求得牢固的既成陋習的獲得解放，而不顧死活地戰勝了它，下一個世代的我們的子女，不就是可以自然地變成自己的東西嗎？也許伊東是為了拋棄俗臭沖天的父母而贖罪，才會在感覺上格外激烈，對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戰慄的本島青年，懷著粉身碎骨的獻身精神從事教育吧。

但留日求學的柏年依然不能原諒伊東春生，「我感悟到，要和宏大的大和魂相連繫，非默默地用我們的血潮去描繪不可。這，比什麼都重要的是決心。我們過去所缺少的，就是這決心。但是，我若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更非是個堂堂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方，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裏的生活，並不一定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不論母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無限的依戀。即使母親以那不好看的面目，到這裏來，我也不會有絲毫畏縮的表現。

其間雖展現青年的熱忱期許，但也可見當時知識份子內在的矛盾與難以平衡的兩難。

伊東和柏年分別象徵「我」心中天平的兩端，伊東代表著日本、現代化（皇民化）；柏年則代表本土、傳統的，二者激烈的衝突正如同主人翁心中的交戰，伊東的生活與硬幹態度為「我」所欣賞，起初不解柏年不滿伊東的原因，以為只是青年人正義感過強所致的偏執，直到於伊東生父葬禮上看到伊東的表現，方始對伊東所象徵的進步化、日本化有所反省，「娶日本女人為妻的伊東，對日方岳母孝敬是對的，但對生身父母有所忤逆行為，是千不該萬不該的。」

「我」於此對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有所覺悟。而看穿幸福背後的爛瘡，主人翁感到茫然，像是「被奪去了一切希望」般，但後來終獲啟發。

那就是要通過醫業，堂堂地活下去。醫生這類人種，會不會只顧人的肉體，而忘掉人有精神的一面呢？我開始領悟、診察了人的肉體，而沒有同時適切地判斷人的感情、心理的力量，沒有這個自信是不成的。

人的肉體與精神，正好可以對比於體制的形式與精神，柏年對伊東的不滿，僅在於對母親的態度，而非反對日本精神，柏年習劍道，到日本求學，彼此的衝突在於對「母親」的態度，追求日本化現代化的同時，是否必須連母親也捨棄？「母親」象徵臺灣，「我」、伊東與柏年三人對母親的對應各有不同，主人翁「很想乾脆拋棄一切，再一次到東京去，但想到孤單的老母親，也就下不了決心」，伊東則是鄙夷「蹂躪」父母，林柏年則是「不管母親怎樣不體面，度對他而言仍是無限的依戀」。²⁷

柏年是具有反省思辨的新生代，雖亦到日本求學但對於伊東春生的行為不以為然，自我期許即使出生在南方也不用鄙夷自己，即使沁入這裏（日本）的生活也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林柏年是與伊東對照的人物而洪醫師的「我」原亦具有皇民意識，但經由觀察伊東與林柏年的爭執，其間雖嘗試居間調停，並為伊東辯護，但最後亦不得不面對伊東日本化言行之虛矯，以及無法

27 許明珠，〈近代與傳統的權衡：我讀王昶雄的〈奔流〉〉，《臺灣文藝》171，2000，頁31-32。

全然否定的茫然。〈奔流〉中的茫然，實亦四篇小說主人翁心靈的共通寫照。

三、疏離與批判的核心：種族血緣的認知歧異

藉由閱讀分析〈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志願兵〉、〈道〉及〈奔流〉文本可見，四篇作品雖各有寫作的取向與關注，然其間卻亦呈現共同或類似的屬於當時知識份子的生命情境與價值。四篇小說中的主角都是疏離於現實的人，雖有固定工作，但心中有更高更完美的追求目標，自我修鍊與提昇似乎成為生活模式，因為知識帶給他們思考、比較及奮發的概念，在思索中獲得快樂希望，但一旦發現知識理想也無法完成人生的夢想乃至救贖時，其人亦終將面對殘酷的現實侷限與打擊。

（一）共同想像之困境

故事中的敘述人物皆以「我」而非「我們」的敘述立場，「我」的疏離孤立呈現了其人背後並沒有社會力量或群眾的支持，其間具有社會不同階層的斷層。〈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的髒亂沒教養的本島人、〈志願兵〉中明貴冷眼所見的街景與車況、〈道〉中的青楠居所、〈奔流〉中的伊東春生所棄養的父母、柏年自認的土臭母親，以及「看不下去」的傳統喪葬禮俗，這些是文中知識份子所生活的背景，卻也是在追尋超越提昇之際，所不得不面對的矛盾。

在殖民時期，日本所代表的是理性的，所具有的文明是科學而進步的。但此一現代性的特徵亦與資本主義與權力系統相聯結。在知識份子的認知中，現代化文明是人生應追求的目標或應遵循的生活模式，然而，當日據時期「現代化」與「日本化」在歷史時空中結成一體，加之殖民的權力因素，形成台灣知識階級無奈或矛盾掙扎的現象。²⁸如此的認知一旦牽涉到日本殖民的歷史與政治因素，相關研究中有關民族意識與尊嚴的關注則難以避免。

28 巴巴（Homi Bhabha）所謂兩個主體位置，顯示殖民認同根本的情感矛盾，由殖民論述形成的曖昧認同最根本的悲劇就是「愛敵人，恨同胞」。

身處當時的作家或知識份子，其心靈地圖是依賴日本政府所建立的價值觀，甚至有所期待，如陳火泉〈道〉中的青楠最後領悟到，應該使用日語思考，才能獲致進步超越，即使是當時被視為是具抵抗自覺的其他作家，也都以日文寫作，語言教育及蘊含其中的價值，才是最龐大也無法被輕易改變的認同與擇取之脈絡。²⁹周金波〈志願兵〉中明貴所言，「我日本語以外不會說，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必須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辦法」，此說顯現，日本所實施的語言與教育正是形成當時台灣知識份子認同的主要基礎。陳建忠以為，要認識在戰後備受爭議的周金波，不能僅憑特定立場而恣意將之定位在「愛臺灣」或「背叛台灣」這樣的位置，周金波至今無悔於當年為台灣人著想而鼓勵志願從軍，以為要流血犧牲才有說大話的資格。³⁰周金波的直接表示認同取向，正是特定時代的主觀展現，亦顯現主體認同不一定要以血緣或民族為基礎，主要與政治時空及個人階層有關。

分析四篇小說文本可見，其中無非就是知識份子的精神與心靈寫照，只因時代因素而有不同的質疑與批判，事實上要重新予以審視，亦需由時代背景加以考量。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意扭轉與教育，實凸顯殖民時代的特徵，即如法農（Frantz Fanon）所言，令殖民地之人與原有文化疏遠，殖民統治所要極力去說服的，就是讓本土人深信，殖民政權的到來就是要為原有的黑暗帶來光明，就是要在本土人的頭腦中灌輸一種認識，如果殖民政權撤離了，他們將立即重新落入野蠻與低級。³¹認同日本文化卻又無法全然擺脫對台灣的認知，隨之而

29 杜維明，〈當代台灣的文化認同與爭取承認的政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9：2，1999，頁225。文中提及日本在台灣統治不同於朝鮮及新加坡的殘暴特徵，並以台灣戰後主流論述積極對日本殖民統治遺產之破壞，其文以為，日本殖民政府甚至還將台灣文化精英轉變為和式生活，許多人在國語（日語）家庭成長，主要的台灣作家如楊逵及吳濁流等人能以中文及日文寫作，在1930年代受教育的人士如李登輝與企業家張榮發等人日語能力媲美母語，可想而知，他們的言論、行為、藝術感受性、行為教養及生活方式都受到日本品味之影響。

30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現代學術研究〈專刊XI〉》9：11，2001，頁65。

31 楊乃喬等譯，《後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法農〈論民族文化〉，頁162。

起的苦悶，固然是因身份無法與日人平等所引起，但另一方面，亦由於其人無可選擇地學習日本所提供的教育與價值觀，認同日本文化與事物的一切，所以有追尋的企圖，追尋過程中亦不免有目標難以達成的焦慮或茫然，如此的衝突在於知識份子面對自己究竟是誰的問題。知識份子並未成為自己同胞的一部份，如四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與平民有一定距離或疏離，與同胞只有某些外在的關係，所以其人僅滿足於重溫同胞的生活，如逝去的童年時光或古老的傳說在記憶中被挖掘出來，或以母親這樣的角色，來對照借來的唯美主義理論，來對比由殖民者獲得的概念，予以重新解釋。³²

小說中的知識份子面臨認同的困境，所謂「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族群一體感可以被「想像力」創造出來，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謂族群是「想像共同體」，而這種情形之所以可能，主要還得借助文化認同的力量。「文化認同」指的是一群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無數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然而，由於集體的歷史記憶在一定程度內是可以主觀建構或重新建構，因此文化認同有時也會面臨變遷或割裂的局面。³³

因此，孤立的個人「我」並無法與其他社會群眾產生所謂的「民族想像」，因其間的聯繫無法建立，就當時文學環境言，皇民化運動的禁漢語、用日文，對漢語文學的理解與閱讀人口的縮減，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四篇文本均是用日文書寫的小說形式，亦為當時文學社團文藝刊物的得獎作品，但真正閱讀的人口未必普遍，距離閱讀的大眾太遙遠，此亦為另一種形式的疏離與孤立，則何來進行共同的政治想像。另一方面，亦由此可以反省，文學並非是客觀意識型態的產物，文學形式的變化反映意識型態的變化，文學亦可以是製造業、作為生產的文學，與作為意識型態的文學。

32 楊乃喬等譯，《後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法農〈論民族文化〉，頁 170。

33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1997.3，頁 101。

(二) 血緣階級之斷層

皇民化運動藉由教育灌輸、戰爭動員，使本島人產生成為日本人的可能與希望。事實上，日據時期即使是皇民化時期，雖說本島人亦為日本人，但其間日台的真正階級鴻溝在於種族而非民族。四篇小說文本中所呈現的，知識份子的之所以有困境，乃在於日本人與台灣人間仍有無法跨越的斷層，此斷層其實並非民族概念，而在於血緣種族的優劣，這是無法藉由精神上的自我提昇或參與戰爭為天皇犧牲所能克服的界線，亦是文中知識份子的焦慮或苦悶來源。

當時知識份子在皇民化運動中，從心靈表現台灣人在日本統治者「一視同仁」的口號中，做為日本國民的一份子，經由日本教育，內心「台灣結」與「日本結」之葛藤。³⁴類似身份血緣的焦慮矛盾也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顯現，其文云：

陳有三拼命用功的原因之一：他對本島人的一種輕蔑。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不正是他的同胞嗎？僅為一分錢而破口大罵，怒目相對的纏足老嫗們，平生一毛不拔而婚喪喜慶時借錢來大吃大鬧、多詐欺、好訴訟及狡猾的商人，這些人在中等學校畢業的所謂新知識階級的陳有三眼中，像不知長進而蔓延於陰暗生活面的卑屈的醜草。

陳有三厭誤於被看成與他們同列的人。看下情則知其所以然：有時候，陳有三被日本人叫「狸仔」（即「汝也」的臺語，含有對本島人侮蔑之意）時，便蹙緊眉頭，現出不愉快的臉色，表示不願意回答的樣子。因此他也常穿和服，使用日語，力爭上游，認定自己是不同於同族的存在，感到一種自慰。

尤其如〈道〉經歷了因身份不同而受到日本人的輕蔑、在思及以往與日本人下圍棋、玩紙牌的而遭受日本人掀翻棋盤及怒拋紙牌的難堪經驗，其文云：

34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臺灣文藝》63：16，1993，頁24。

對於自己的出身，靈魂的成長如何是認真思考的問題。在那種場合，他一面追究那些像旋風般在腦中翻滾的念頭，一面繼續思索著：「假使對手不是自己，而是他們同種的日本人，那個人仍然敢弄翻棋盤嗎？」

青楠發現血統身份的難以超越，即使改良腦灶有功，也受限於是本島人而無法升遷，呈現出日本人與台灣人本質上的不同，因此更加努力思索自己的出身與日本靈魂的成長。1937—1945 這八年迥異於前四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當局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為達此一目標，各層政府透過各種組織，致力於各階層的教育活動，提倡愛國精神和皇國思想。此為日本在臺殖民統治時期最全面且密集的愛國運動，加之當時為戰爭時期，整個社會籠罩在濃厚的戰爭氣氛中，此關係生死，既嚴肅且嚴重，臺人日人同處一戰爭情境，共同歷物資缺乏與盟軍空襲，此實有助於內部之凝聚力，使民族分際變得模糊。又因皇民化標榜「內臺一如」，甚至有意的合理化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這種差別待遇之中自然包含了國家的愛與誠」。³⁵根據其論理，臺人可以藉由特定途徑成為日本人，從制度上得以泯除民族界限，消除差別待遇，公學校與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實施義務教育、徵兵，撤廢保甲制度等都是在此邏輯下之產物。³⁶如尾崎秀樹〈戰時的臺灣文學〉所云，「若同化政策是指成為日本人，則「皇民化」的意思是「成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統治者所企望之皇民化的實態，不是臺灣做為日本人活，而是做為日本人死，因此做

35 竹內清，《事變與台灣人》，《台灣新民報》，1939，其言「根據一視同仁的聖旨而制定的「台灣統治方針」，才是皇民化運動的基礎。總之，本島人和內地人都是帝國臣民，沒有任何差別待遇。但是，由於他們是剛歸化的人民，因此在性格、民情、語言、風俗、教育等方面，與內地人有相異之處，所以法律制度等若與內意完全相同，則反而會使統治方針無法如期完成，造成不良後果。因而在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制定上，與內意有若干差別。但是這些差別並不是人格上的差別，也絕對不是為了差別而差別；主要是使台灣人成為日本良民的一種手段而已，所以這種差別待遇之中自然包含了國家的愛與誠。」

36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代序〉，頁3。

為忠良的日本人的意思，是指發現做為日本人死之道理，並為它奮進。」³⁷

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身份落差並非只是種族差異而已，同時還有極其深刻的階級差異。透過資本主義的邏輯運作，台灣人對於自己的人種不免會產生猶豫與懷疑。在日據時期，唯有知識階級方能對於日本以其殖民政權所灌輸的文明、文化乃至價值有所體認，甚至形成意識型態。意識型態不是教義，而是指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社會職能上，並因此阻礙他們真正地理解整個社會的那些價值、觀念與形象。四篇小說中的知識份子既對於知識、理性等人生價值有所嚮往，且企求超越，卻似乎也不能完全擺脫自我出身的差異與限制，在彼此的權衡矛盾中，苦悶與焦慮亦因此而生，形成當時知識份子某一部份的內在心靈圖像。是否參與皇民時期的戰爭動員其實亦僅是屈從不屈從而已，文本中的主人翁認同日本文化日本精神而非中國（如〈奔流〉中的「我」憶及不敢承認自己是臺灣人的往事），因為在其人的教育及認知中不知此一概念與價值，其所做的現代性想像，是處於日本統治時期在語言、文化、經濟與階層等背景中，所做的自我認同。

（三）皇民內涵之檢視

種族主義夢想的根源，其實存在於階級的意識型態，而非民族的意識型態中，特別是統治者對神命與血統及教養等主張。³⁸身處其間的台灣知識份子，既藉由日本殖民政權獲致啟蒙的機會與認同的依據，然對於不同民族間高下優劣之矛盾，亦藉由文藝創作有所呈現，尤其皇民化時期之特定創作空間與限制，尤顯當時知識份子之認同矛盾，其間價值意涵明確，然是否應以道德或民族標準衡量之，則有待思考。

37 尾崎秀樹，蕭拱譯，〈戰時的臺灣文學〉收於《臺灣的殖民地傷痕新論》，（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頁302-303。

38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1999），頁163。

民族（Nation）與種族（Race）的意涵不同，卻在皇民作家皇民文學的相關評論中一再出現並用以論述之基礎。有關民族定義廣被沿用的是馬克斯的定義，亦即以四項基本特徵之共通性為基礎，即言語的共通性、地域的共通性、經濟生活的共通性以及民族文化固有特質的共通性，而由其表現心理狀態的共通性，並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歷史性建構。它是一種人類堅固的共同體。此一定義並不重視血緣的要素。藤間生大以為，今日我們使用古代以及中世紀之間的所謂「民族」一詞，其實是 Volk（基礎集團）之意，而不是 Nation。何以明知二者有別，卻一再混淆使用呢？這是由於至今尚無完整的慣用語彙之故。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並不存在 Nation，與其說以前沒有民族，不如說以前就存有 Volk，與其說從無變為有，不如說以前就有 Volk，它因完成結構上的變化而成為 Nation。Nation 當然是以言語、地域、經濟生活和文化共通性中表現心理上的同一性格為基礎，從而產生一個集團，但何以分散性很強的 Volk 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完成整合呢？這是因為存有一種推動之力將 Volk 整合成 Nation。³⁹

臼井二尚在辨別民族意涵時提出，Volk 可以歸類為對應於封建制度階段下未發達的民族。封建時期以各地的領主諸侯為中心，細分為許多自給自足的地域，從而人民也各自對這些地域強固地保持其特殊性與封閉性。當然，各地域的上層之間互有交涉，當時基督教和拉丁語超越今日的民族框架而具有普遍性，但下層的大眾並非如此。其次，在中世紀的身份社會中，上層與下層階級的共同體意識還不充分。當然，中世紀的領主或武士與農民的關係，若與奴隸制社會相比，確實階級間的關係已較接近，但上層與下層之間仍存在很大的斷層，全體都為一個民族的集團意識，還停留在未發達的階段。如此，中古歐洲以地域的分別及階層的分別，而區劃成水平和垂直兩方面的階級，故民族的文化共同體還難於成立。停留在此階段的所謂未發達之潛在性民族，一般都稱之

39 藤間生大：〈古代民族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編，《歷史中の民族問題--歷史學研究會一九五一年度大會報告》，岩波書店發行，1952。

為 Volk。Volk 是繼部族階段之後，統合幾個部族而形成，其中包含不少方言的差異，唯其全體並非十分明確，而是從做為一個共同的民族集團逐漸凝聚而成。⁴⁰

一如米雀斯(R. Michels)所指出的，「對民眾來說，路易十四時代所謂的祖國概念，只是王朝國家和忠愛王朝的義務之還原。」此處所反映的即是「朕即國家」(Ll Etat, c'est moi)的著名說法，可見民眾還欠缺自覺性的民族意識。Volk 還不能充分排除階層性或垂直性的障礙。要打破此一障礙，不外確立民主主義，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法國大革命。在極權主義的國家之下，地域的同一化雖然相當進步，但是人民仍為國王的臣民，人民之間擁有的只是 Volk 的共同情感，他們自己形成「吾等集團」的民族自覺尚不明確。米雀斯以為，當「國家對所有的子民承認同一的權利，依此而使所有子民能向其要求同一的愛」的意識開始蔓延之後，始能排除社會的階層性障礙。如此，居住於廣泛地域的所有住民，方始自覺彼此為同一民族的同胞。如此一來，Volk 即發展為 Nation。Nation 是指 Volk 這種未發達的潛在性民族，由於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民主主義的確立等，形成有自覺的民族。積極支持所謂「我們」的同胞意識與「吾等集團」的民族即是 Nation 的特質。⁴¹

日本民族的成立應在明治維新(從 1834 年的天保改革至明治十年的期間)以後較為正確。民族一詞於 1870 年被日本翻譯成具有血緣的意涵，當時日本只有「種族」而無「民族」觀念，台灣人亦無，中國更是混淆，還是以血統主義為主，例如 1909 年清朝宣統元年頒佈的《大清國籍條約》和 1914 年袁世凱政府的《修正國籍法》以及 1929 年國民政府的《修正國籍法》都規定：「生時父為中國人者」和「生於父死後，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具有中國籍。直至 19 世紀後期，西方資本主義與軍事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亦隨之而至。民主政治思潮的輸入不僅形成人們否定君主政治、進行民主革命的重要條件，同時也促

40 臼井二尚：〈民族發達の諸段階〉，《哲學研究》362，1947，頁 24。

41 柯羅曼(W. M. Krogman)，《社會學講座五：民族與國家》(東京：東大出版會發行，1958)，頁 17-20)所引。

進政治觀念的更新。對傳統的臣民觀念、對於公民及公民權利義務加以思考反省。至梁啟超主張的「國民」方已接近「公民」意識。⁴²

日本的「臣民」與「國民」的概念亦有所混淆，但卻用以成為皇民化運動的宣傳，於大正之後由「臣民」變為「國民」，日本「國民」做為「天皇的臣民」，形成「效忠天皇」和「絕對服從」的國民意識。把天皇與絕對服從加以聯繫，所謂國家和軍隊喪失自我與個性，國民失去了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和意識，呈現的國民與臣民恰是相對的概念。所以皇民運動的動員論述是使臺灣人做臣民，且是為天皇而死的臣民，而非國民。

因此，若以前述相關定義檢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四篇小說中所謂民族意識，其實是有所疑慮的。前述四篇小說中的認同焦慮實亦來自血緣此為難以超越的鴻溝無法藉由接受日本教育或參與戰爭而輕易克服。又因為文本中都是以「我」而非「我們」為敘述者，其人既與一般大眾疏離，實無法與群眾進行政治想像，自無法形成特定民族意識，亦無法評價其中所謂民族意識的反省或抗爭。由此以見，對所謂皇民文學的相關評論往往以民族概念出發，無論是以中國或臺灣為思考立場；無論是質疑或維護，往往都忽略此一認知內涵的歧異。

當時知識份子之傾心日本精神，乃屬個人主觀認同，有其時代背景與個人抉擇的意識差異，不同立場之詮解往往無法避免片斷式的評價，亦難獲致彼此的理解。〈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道〉、〈奔流〉及〈志願兵〉四篇小說所追尋的都是精神境界的提昇或超越，身處皇民化時期，以及日本民族價值的強力傳輸氛圍，卻仍必須面對自身血緣及被殖民的身份，而難以突破或如願，是以作品中人物的內在心靈實有一致的演變過程，即追尋、創造、努力以及過程中甚至最後的茫然與消沉，此即為此四篇作品所一再凸顯的知識心靈。若不侷限於民族意識的批評，此類精神上的戰鬥、不與現實妥協的過程，其實是知識份子

42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四。如梁啟超提出了「國民」的概念：「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捨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具有理想且企圖突破現狀的表現，任何時代均有發生之可能，皇民化時期自亦不例外，若此，則應可以不同的角度檢視當時作家之心靈世界或小說之意識型態。

結語

四篇小說中一再呈現由日本教育所形行的認同內涵，其中包含身份的確證以及相應的與原有自我的分裂，於此衝突掙扎下，加之所習得的知識與價值，以至有期望，學習、以至超越的動機所致，在既定的時空背景下，所表現出的屬於人生極至的價值美感，具有追求優雅幸福的具體目的，若僅以民族對抗或背叛的角度來理解，則失之簡化。

一、主體認同與詮釋模式之建構取向

認同牽涉到主觀詮釋，它必定在本質上是選擇性與策略性的。即使國家不斷地把這些論述及其表象合理化客觀化，但主體決定認同於某一社群或國家時，其亦同時在認同該社群或國家所抱持的共存價值和共同生活方式。現代國家的「想像共同體」能隨時演變，個人認同亦需（透過策略性的選擇）不斷地「再生產」。⁴³審視皇民作家的人生歷程可見，無論其人認同日本或中國或台灣，無論執著堅持或改調整修正所認同的內涵，其人之認同與擇取均有類似的過程。

當個體有了「認同」，即意味其人已被「情境化」，也意味每一個有認同對象的人，是無法離開脈絡之外的。另一方面亦可見，認同並非是理所當然的，其中有權力建構的背景因素。做為只能接受日本價值輸出或啟蒙的知識份子，其人對於現代化對於知識理性不免有嚮往之意，本身亦無批判能力，於此產生

43 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1999，頁119。

扭曲與衝突。⁴⁴因此，皇民作家於日據時期有其認同取向，戰後的文學研究者亦各有中國或台灣的民族意識，並且以其人之民族意識做為論述與詮解基礎，無論是中國文化之強制扭轉原有日本文化；或以台灣做為主體的台灣文學史建構工程，不同的思考理路中亦呈現各自所具有的思考脈絡與原因，彼此的內涵不盡相同亦未必能協調一致，然整個認同形成之原則卻有其類似性，也是應該被關注的。

日據時期皇民時期作家無法選擇其所處的歷史與政治時空，即使戰後的國民政府時期，其人對於自己言行亦各有主張或詮解，無論是哪一時代的反思或肯定，其間或有分歧，或不符時代的價值權威，然自有一定的認同或取捨之依據，這是必須強調的因素。以主體認同為思考原則而言，皇民時期之作家有其被影響與選擇之可能性，此類認同之產生或許可界定為中性的型塑過程，而未必一定要以民族大義加以責難。

所謂民族意識，其所具有建構特質與影響亦為論者所關注，蕭阿勤以為，面對「日據時期」的歷史經驗是什麼的回答，事實上等於在建構關於這一段過去的集體記憶——亦即針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內涵、特質、文化與政治意義、歷史定位等，建構一整套知識內容與詮釋方式等，並且希望「我們」「中國人」或「臺灣人」以這種特定方式記憶這一段被殖民統治的過去。在戰後臺灣文化與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建構中，「抗日」經驗——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早期的武裝抗日——可以說居於核心位置。在這個被殖民集體經驗敘事中，實際上也以「抗日」的集體記憶建構與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關係最密切。在國民黨統治的公共領域中被視為合理正當的日本殖民統治集體記憶，其中臺灣人的抗日經驗，可以說被「模式化」——亦即被「中國化」，或更恰當地說，是被「（中國）民族化」——而成為其集體經驗敘事模

44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收於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251。

羅成純於研究龍瑛宗時以為，以批評的眼光檢討自己固有文化，於近代化過程中原不可或缺，然而台灣的現代化卻是與日本殖民台灣息息相關，現代化精神亦受殖民政府所限制，陳有三的近代精神與個人主義是來自統治者思想支配下的產物。

式中一個極重要的歷史情節。⁴⁵

在此類集體經驗的建構下，一再地模式化抗日敘述，中國民族意識成為集體論述之參考架構，皇民文學之作家的主張與認同喪失論述主權與詮釋權，沒有「合理化」背景，由此而簡化了其中的個人特定且複雜多方的認同取向與經驗，甚至以此一標準認同論述做為衡量民族意識與道德之原則。無論是日本或國民政府，台灣的歷史與族群意識相互結合而製造一國族認同，事實上，這卻不過是國家為求定義本身現代性的精神而有的想像建構。⁴⁶

二、創作評論與相關脈絡之反省解構

無論是評論者所視為抗日或媚日的作家，顯然地，均在日本殖民政權所主導的文學環境中，創造自己的作品及從事文學活動，其間的人際網絡與情誼，往往無法自限於所謂中國人或台灣人之族群，而甚至與日本人亦多有互動聯結，尤其無法改變的是，其人必須在此一政治時空生存或從事文學活動。凡此均影響其人的生活與思考面向，亦是評價其人之思想與價值觀乃至認同內涵時，所無法忽略的因素。⁴⁷

身份是由文化感情與現實策略所交織而成，文化感情中帶著無以名之彷彿天生的固執；而現實策略則壓低較偏向本質的因素，強調以福祉或利害為依

45 蕭阿勤，〈抗日集體記憶民族化：臺灣一九七零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頁 185-186。

46 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頁 111-2。

47 張誦聖指出，四零年代日本殖民地台灣的优秀作家——如楊逵、呂赫若、張文環、龍瑛宗等——大都透過日本文壇體制及日文閱讀來接受西方藝術觀念的啟蒙，而獲得日本文學獎成為台灣作家追求的目標，更顯示出日本「中央文壇」與「臺灣文壇」之間存在著的主從關係，相對來說，戰後台灣的文學場域改變卻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自一九二零中葉以來持續發展的台灣新文學傳統，在 1945 到 1949 年間過渡成中國體系後，幾乎不復存在。文學場域被一套新的邏輯所統御，作家在日本殖民時期所累積的文化資本，（包括最基本的語言能力）一夕之間遭到貶值，尤其是四九年後這套邏輯和國府反共戒嚴時期「中國中心」的威權體制緊密結合，使得解嚴後的研究者很難不從政治或人權的角度來觀看這一段文學史。見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頁 35。

歸，身份的形成便是建立在這兩種辯證態度的發展上。身份對任何人都不是明確不變的，但較大範圍的文化或政治性身份危機，則往往是社會產生重大變動的特殊狀況下較容易出現。⁴⁸生長及活動在殖民時期的作家，所受的教育與因之而形成的政治歷史文化價值取向有其形成的脈絡，實無法擺脫加之個人之遭際或階級等社會因素，往往影響其人之自我認同，皇民時期的作家表現於不同政治時空，即有不同解讀與評價，其中牽涉道德與是非，而民族認知內涵為衡量前提。

其人於小說創作中呈現其因特定時空所型塑的政治與身份想像，其後的相關批評亦再此以特定政治認知為評論依據，形成不同時空的想像內涵相互衝擊。無論是文本創作或批評文字本身即是一種書寫，具有深層意涵。與敘述不同的是，「評論與描寫」至多是「對生活秩序概念的純粹替代」，與其說是另一種意識型態的表現，不如說是因意識型態影響而有的意識壓抑。敘事話語並非中性客觀，不僅是意識型態生產的手段，而且還是一種意識模式，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亦有助於意識型態的建構。所以，敘事話語與意識型態互為作用，意識型態似乎也是對現實敘事理解的工具。⁴⁹由此觀之，即使文學，亦是意識型態的產物，也是一種製造產業。

是以，主體認同與政治氛圍有其虛構及變動性，當認同或主體性的概念被視為是不同立場與詮釋觀點的呈現，則對所謂文化論述背後之認知前提與形成的功能即有重要的影響，若族群認同與文化論述皆有其建構性與虛構性，其中的真實與是非又何以定位。⁵⁰唯有經由對權力宰制及文化霸權的去神秘化（不只去殖民化），個人才能自由地選擇，使得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的理念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實體。認同意圖比任何認同的實際內容還重要，認同在知

48 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間徘徊——台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份」的轉變〉收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頁194-195。

49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十二 講故事：歷史與意識型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50。

50 陳奕麟，頁123。

識和政治論述中的出現，是促成認知危機的微妙社會變遷的後果。認同伴隨著一種和特定族群間的關係，其存在只有相對於類似的界線社群才有意義。⁵¹因此，所謂協同日本國策或屈從日殖民政權的皇民作家是否應苛責？同時，以中國與台灣做為不同的民族認同基礎所形成的極端觀點，亦影響對日據時期皇民作家之評價。主體不同見解或認同之產生，乃因特定教育所致，而當時主導教育之政府或為日本殖民政權或日後之國民黨政府，其間凸顯政治藉由教育形成認同的過程，就此一角度思之，認同與詮釋活動實只有相對而沒有絕對，特定時空因素必須加以納入考慮，只有彼此異同，但未必有是非。台灣文學不可避免地與政治因素相關，無論是創作活動或作家本身，乃至主流價值均受到當時政治環境所影響或操控。即使日後之批評亦不免以道德或政治標準加以分析，文學仍無法具有獨立性。事實上，就因文學難以有獨立性而必然受到當時某種政治氛圍之主導，是以研究者當更應有所警覺或嘗試做多元角度之思考。

51 陳奕麟，頁 128。

文與哲・第五期・2004.12

參考書目

1. 書籍

文本

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2002。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張恆豪主編。2000。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張恆豪主編。1990。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2000。決戰台灣小說集：乾之卷、坤之卷，東京：ゆま
り書房。

陳火泉，〈道〉，《文藝台灣》6:3，頁 87-141。

論著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
散佈，台北：時報文化。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2000。國族主義，台北：聯經。

Jurgen Habermas 著，曹衛東譯。2002。後民族格局，台北：聯經。

Michael J. Sandel 萬俊人等譯。2001。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南京：譯林出
版社。

霍爾（Stuart Hall）、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1998。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
台北：元尊文化。

方孝謙。2001。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
台北：巨流出版社。

王曉波。2001。台灣意識的歷史考察，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

江自得編。2000。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第一屆台杏臺灣文學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呂正惠。2002。台灣文學問題：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

周英雄、劉紀蕙編。2000。書寫臺灣：文學史、後殖民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社。

周婉窋，2002。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出版社。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著，陳永國、張萬娟譯。2003。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梁明雄。1996。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許南村編。2002。反對言偽而辯：陳芳明台灣文學論、後現代論、後殖民的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

郭洪紀。2000。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文化。

陳芳明。1998。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張京媛編。1995。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

彭瑞金。1991。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社出版部。

游勝冠。1997。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出版社。

楊乃喬等譯。2001。後殖民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2. 期刊、論文

（1）中文期刊論文：

方孝謙。2001。〈日據時期本島人的兩極認同：庶民小說與知青文本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2，頁 183-228。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頁 6-19。

王學玲。2002。〈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份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為主的討論〉，《中外文學》30：10，頁 172-195。

石之瑜。1993。〈論當代政治心理學思潮中的認同問題〉，台灣大學《中山學術論叢》11，頁 91-110。

江仁傑。1998。〈龍瑛宗、呂赫若小說中的台灣知識份子與階級〉，《台灣歷史學會通訊》6，頁 23-30。

-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頁 83-121。
- 羊子喬。1993。〈歷史的悲劇、認同的盲點：讀周金波〈水癌〉、〈尺的誕生〉有感〉，《文學台灣》8，頁 231-236。
- 何義麟。1986。〈皇民化期間之學校教育〉，《臺灣風物》36：4，頁 47-88。
-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1，頁 5-39。
- 李文卿。2002。〈穿越皇民化運動時期的動員表象：《決戰台灣小說集》編輯結構析探〉，《台灣文學學報》3，頁 169-208。
- 杜維明。1999。〈當代台灣的文化認同與爭取承認的政治〉，《中國文哲研究通訊》9：2，頁 215-238。
- 林瑞明。1993。〈國家認同衝突下的台灣文學研究〉，《文學台灣》7，頁 14-32。
- 林瑞明。1993。〈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臺灣文藝》63：16，頁 20-43。
- 垂水千惠。1993。〈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台灣文學的研究在日本》，《台灣文藝》16：136，頁 44-57。
- 星名宏修。1992。〈「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台灣文藝》13：132，頁 4-24。
- 星名宏修。1992。〈「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二)另一種皇民文學：周金波的文學型態〉，《台灣文藝》13：133，頁 4-25。
- 莊明哲。2001。〈台灣人或中國人：分裂的民族認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9：1，頁 137-158。
- 莊明哲。1999。〈民主制與民族主義：一個修正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7：2，頁 33-57。
- 許明珠。2000。〈近代與傳統的權衡：我讀王昶雄的〈奔流〉〉，《臺灣文藝》171，頁 28-37。
- 陳芳明。2000。〈皇民化運動下的四零年代文學〉，《聯合文學》16：7，頁 156-165。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頁103-131。

陳建忠。2001。〈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現代學術研究〈專刊 XI〉》9：11，頁53-69。

陳建忠。1999。〈徘徊不去的殖民主義幽靈--評垂水千惠的〈臺灣的日本語文學〉〉，《文學台灣》29，頁190-205。

陳映真。1984。〈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文季》1：6，頁1-11。

陳維剛整理。1994。〈現代的「自我」反省：泰勒與杜維明的對話〉，《當代》99，頁101-117。

陳翠英。1998。〈失落與重建：試論龍瑛宗《紅塵》的歷史記憶〉，《文史哲學報》49，頁1-28。

陳翠蓮。2002。〈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9：2，頁145-201。

塚田亮太、黃毓婷譯。2002。〈閱讀『周金波日語作品集』：一位台灣「皇民作家」的精神軌跡〉，《台灣文學學報》3，頁1-22。

葉石濤。1995。〈新文學作家的民族認同和階級意識〉，《文學臺灣》13，頁9-11。

河原功，葉石濤譯。1992。〈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日本統治下在臺灣的文學運動〉，《文學臺灣》3，頁225-264。

廖咸浩。1995。〈超越國族：為什麼要談認同〉，《中外文學》24：4，頁61-76。

廖炳惠。1994。〈泰勒論現代性與多元性〉，《當代》100，頁10-29。

蔡英文。2002。〈民族主義、人民主權與西方現代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頁1-47。

蔡英文。1997。〈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科學論叢》8，頁51-84。

鄭明珠。2003。〈論「皇民文學」詮釋應有的態度〉，《東方人文學誌》2：1，頁151-174。

蕭阿勤。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一九七零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

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臺灣史研究》9：1，頁181-239。

顏厥安。2000。〈自由主義與國家認同：以一個理論問題懷念張忠棟老師〉，《當代》157，頁88-99。

張恆豪。1992。〈〈奔流〉與〈道〉的比較〉，《文學臺灣》4，頁243-259。

張恆豪。1990。〈反殖民的浪花〉，收於張恆豪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2）學位論文：

陳明柔。1992。「日據時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俊雅。1992。「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韶筠。1993。「日本統治期戰時體制下有關台灣文學之考察——以陳火泉〈道〉為中心」，東吳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柳書琴。1994。「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3. 報紙：

陳火泉自譯，〈道〉，《民眾日報》12版，1979.7.7—1979.8.16。

陳映真，〈思想的荒蕪——讀「苦悶的台灣文學」敬質於張良澤先生〉，《中國時報》1981.2.22副刊。

葉石濤〈新文學家的雙重性民族結構〉，《中時晚報》副刊〈文學筆記〉，1992年4月12。

4.網站：王學玲譯，陳火泉〈道〉，「台灣文學研究工作室」1999.02.05.

Political imagination appeared in Taiwan novels during Japan's Colonization, 1937-1945

Shu li-fang*

[Abstract]

The paper is written to study the intellectual spirits appeared in Taiwan Novels written during Japan's Colonization, 1937-1945. For self-identity that usually formed by some political ideology such as nationalism, there would b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to Taiwan Colonization novels in different regimes and nationalism. Consider the novel writers' education and ideology from Japan's promotion, this study would exhibit the visionary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review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and depressions from these novels printed during Japan's Colonization, 1937-1945.

Key words: Taiwan colonization literature, self-identity, ideology, national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